

# 学术论评

## 重负下的追求

### —《图书馆学通讯》印象

范并思 刘炜

在国内现有数十种图书馆学专业刊物中，《图书馆学通讯》(以下简称《通讯》)是相当难读的一种——当然不是刊内单篇文章的内容难读，而是这份刊物作为一个总体难读。算来，与它相处将近十年了，若单从专业的视点我们仍没有任何把握对它的总体水平和特色作一番科学的评述；而从图书馆专业与广阔的社会大文化和多维视角观察，《通讯》在本专业领域中力图将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和国家意识形态融于一体的意向却昭然可见。因而我们对《通讯》总有一种鲜明的，像夏日荷叶上集聚的露珠，令人凝神，晶莹难忘的印象。这是我们乐于将《通讯》印象与同行们交流的初衷。

《通讯》紧随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行进步伐，真实而完整地记述了这一重大转变时期的重大活动和人们当时的认识，从而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可靠见证。尤其是1979—1982年间，中国图书馆事业恢复和发展较快，《通讯》从中国图书馆学会的成立到恢复国际图联席位，从国内图书馆事业各项活动的开展到外国图书馆事业状况的介绍，从图书馆教育的兴亡到对图书馆现代化的呼吁与展望，都作了详尽的报道和大声疾呼。这些纪录当代事业发展的内容使《通讯》成为一部具有当代图书馆运动史的重要价值，显然是其它图书馆学专业刊物所难于具备的。

—《通讯》作为中国图书馆学会的学报，对于图书馆学的学科理论建设具有义不容辞的重大责任。近十年来，中国图书馆学理论乘社会思想解放和图书馆事业的变革的东风，全方位地更新着自己的理论形象。

《通讯》积极参与并推进了这一时期的理论进步，刊出了一批以《中国图书馆学思想发展及其影响初探》为代表的作品。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新旧图书馆学理论思潮强烈碰撞的动荡时刻，《通讯》丝毫没有因自己刊物的影响大，各方反映敏感的特殊位置而关闭起理论探索的大门，没有找一些四平八稳的课题做学究式文章，而总是积极投身理论变革的战场，大胆组织理论批评，扶植新学

—  
每一种学术刊物都有其所追求的总体风格和奉行的办刊宗旨，这是最容易使人形成总体印象的东西。那么，《通讯》的风格和宗旨是什么呢？

—《通讯》最初是中国图书馆学会的机关刊物，刊物兼有其学术性和群众性要求，其中有较大篇幅属于报道性内容。《通讯》复刊迄今，恰逢中国图书馆事业从“文革”的巨大灾难中复苏，并同时开始由传统图书馆向现代图书馆进军的历史性转变时期。

新议，在新时期图书馆学的理论大进军中举旗陷阵，率先发祥。《通讯》的“图书馆新学新议”和“学术论评”等栏目明显地记载了它在这方面的贡献。1985年以后，中国图书馆学观念的变革和思潮的冲突更加明朗化，《通讯》的这一特点也日趋鲜明。

然而，毕竟《通讯》是代表中国图书馆学会的刊物，其位置显居全国图书馆学刊物之首。因此，人们理所当然地对它寄予更高的期望。作为一种通讯性刊物，《通讯》是季刊，出版周期太长。它的出版周期不但无法与中国科技情报学会的通讯性刊物《科技情报工作》（月刊）相比，甚至比国内有的省市级专业刊物的周期要长。这一限制，难免不影响《通讯》更全面及时地反映重大的学术活动和中国图书馆事业的状况。作为一种理论性刊物，《通讯》的容量又似乎太小，尽管它每期内用于刊登理论文章的篇幅较多，但它每年出版的期数要小于某些地方刊物。由于这一限制，《通讯》就难于充分地照顾图书馆学各个分支领域的阶段进展以主导学科全面进展。

在我们看来，《通讯》的责任是太多了、太沉重了！重负之下，它似乎一直在刻意追求些什么，在顽强地表现个性，但直到目前我们还很难说《通讯》的办刊宗旨和编辑审美趋向已真正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这似乎要从客观上去找寻原因，如把学术性与群众性任务分开，改刊期等，而编辑者从总体上追求全面完满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而以基础理论为重点的意向和情怀是不难捕捉的。

## 二

学术期刊是重要的学科前沿阵地。一种优秀的学术期刊，应能够真实反映理论的进步和发展趋向。人们对一种学术期刊的信赖程度，也取决于它所表现的理论研究状况的

程度。哪怕是《通讯》这种报道性、理论性兼容并蓄的学术期刊，人们总要求它的学术性要多于前者。

我国的图书馆学刊物大部分产生于1979—1980年间，基本属于同一时期的产物。这批判物产生之际，也正是新时期图书馆学理论以崭新的姿态顽强崛起的时刻。当时不少刊物，特别是吉林和四川两省图书馆学会刊物，刚一问世便显得闯劲十足。它们当时都曾有成效地在理论前沿阵地耕耘着，吸引和鼓舞了越来越多的人投身于新时期图书馆学的理论建设之中。

《通讯》对理论进步的密切关注是明显的，而实际行动则似乎经历了一个深沉的反思沉淀的过程。《通讯》的并列刊名是1984年由原来的“会刊”改名为“学报”的。尽管改名后报道性内容没有取消，也不见减少，但从总体风格来看，《通讯》的重心确实有了转变。现在，《通讯》显然是我们了解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理论进步和发展轨迹的必不可少的核心刊物之首了。它的重心已从图书馆事业发展实际记述逐步坚实地转向图书馆学及其哲学研究，如内部外部、层次、理论形态及科学方法等等。

若对《通讯》自复刊以来发表的研究性文章作番粗略考察，可以看到它的内容相对集中于四个方面：图书馆工作研究，包括现代化、标准化规范化等技术性内容以及中国和世界的图书馆事业的研究介绍；图书、文献、史事研究，包括中外古籍版本等内容；理论探讨，包括重要译文；学术论评文章。这些形式和题材均不拘一格的文章，与图书馆学具有很强的应用性特点和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由简单经验描述向理论化过渡的特点是基本合拍并相适应的。《通讯》在1979—1987年间，在下列几个方面的理论工作尤有较大影响：

(一) 整理发表了刘国钧、王重民等老一辈图书馆学目录学家的著作，郑重地有选择地继承发扬了“文革”前图书馆学的一

些理论成果。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81年刊出的刘国钧先生佚文《1965年以来美欧图书馆学论文简介》。由于刘国钧先生在选材与评述中十分鲜明地渗入了他对中国图书馆学现状与发展前景的深切关注，这篇文章的作用实际远远超出“简介”的范围。它在增进人们对外国图书馆学的了解的同时，更激发了人们对改革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的紧迫感。

(二) 翻译和评介了西方图书馆学理论的新成果。这一工作领域涉及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图书馆学教育、目录学、图书馆事业史研究等许多方面。其中谢拉的《关于图书馆学的基本原理》(1982年)和《美国图书馆史研究述略》对我国图书馆学开拓新的理论空间起到了很好的开导和借鉴作用。

(三) 引发了一批热心从事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者从一个崭新的高度和角度，重新审视图书馆学理论自身重建的讨论。如《关于“开展知识学”的研究的建议》(1981年)、《论我国新时期图书馆学研究》(1982年)、《应该转变图书馆研究的方向》(1985年)等等，都曾独树一帜，给图书馆学的原有理论带来了一系列根本性的震荡，在一定程度上触动了图书馆学研究方向的健康发展。

(四) 直接参与了新时期图书馆学基本理论的变革，促进了新型图书馆学理论格局的形成。如刊载前述关于“知识学”研究。同时，又不断地对发展着的各种观点，对各个理论热点进行思考和作出评价。又如对1985年以后“学术论评”栏中持续不断地围绕“研究方向”讨论所产生的有价值的思想火花的着意滋润和催化。

(五) 对图书馆情报事业的开发研究、图书馆学教育、图书馆学方法论等重大课题，表现了经常性的关注并加引导。早在八十年代初，它率先并一直坚持不断对强化和深化图书馆情报职能的宣传、不苟同于“一体化”和“替代”说，尤为难得。

### 三

自七十年代末以来，中国图书馆学界经历了许多时髦课题的讨论，诸如“三个世界”的理论，学科对象、性质等一些基本概念的定义，理论体系、结构，及图书馆“现代化”、有偿服务，等等。在这些课题热极一时，*《通讯》*却往往保持沉默，没有介入，或者说它超然游离于“学术时髦”之外。这就使得一些期待*《通讯》*对这些讨论提出权威性意向或评论的人感到失望，甚至一度影响了*《通讯》*这样一份刊物所应有的学科凝聚力，看来这是种误会。

其实，对一些短命的热门课题的过分热衷关注，正是图书馆学的顽症弊端之一；正是这个学科课题贫乏、队伍素质欠佳、知识结构欠合理的具体表现。曾几何时，一旦时过境迁，当某些所谓的“学术”热点急剧冷却后，那些热闹一时的商榷与反商榷在人们的头脑中也渐渐淡漠，一些追逐时髦的刊物也随之为人所淡忘。而正是在这学海无边中方显本色。*《通讯》*给人的是一种后劲十足和常读常新的感觉。回过头来，翻阅*《通讯》*，似乎期期都有没读过的文章。这些文章经过一段时间的埋没后，似乎更值得读读了。

学术刊物对热门课题的关注是可以理解的。有所谓热门课题，就定要有一批刊物为之呐喊。热门课题的交替变化，可能使理论进步显得有声有色，引人注目。但是按常规来说，一门学科的发展若完全由热门课题来推动，学科的内部结构必然会失去平衡。因此也必然会有一定数量的刊物以具有相当的洞察力和预见性为基础的独立性，游离于学术时髦之外，以平衡驾驭学科发展的内部构成和研究趋向。鉴于中国图书馆学界这种刊物不多，*《通讯》*的游离性和驾驭力就显得颇为可贵了。我们宁可有更多的图书馆学专业刊物能“冷眼向世界”，不抢热码头，坚定

地走自己的路，以各自鲜明而不拘一格的特色，使中国图书馆学刊物体系更加丰富多彩。

## 四

一般来说，学术刊物无非是研究者发表和交流科研成果的场合，最佳编辑者顶多只是研究者和读者之间相互沟通的中介。然而对于一家有作为的刊物，它往往善于寻求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向作者和读者传达编者的意向、理论兴趣或价值观。在以这种形式推动理论研究的进程中，刊物和它的作者、读者不期而然地会形成某种新型关系。这方面，《通讯》给人的印象也是很深的。

由于种种客观原因，中国图书馆学的建设在很长一个时期里主要是由个体的分散自发性质的研究形式而运动发展的，作为现代科学特征之一的集体研究，很少出现在图书馆学界。1985年以后，图书馆学理论进展的种种困难使理论界意识到集体研究的必要性。然而由于体制方面的原因，往往无形地限制了集体研究的开展。在这方面，《通讯》的笔谈、通讯、论评（短评）、编、注、按等实际确在为现时的图书馆学界提供了一种集体研究的对话通途。以《通讯》中富有特色的“学术论评”栏目为例，在这个栏目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批理论兴趣明显相似的理论工作者，自然地围绕某些中心课题如“研究方向”来展开讨论，天长日久，它们已形成了一种类似集体研究性质的组合实体，尤其是讨论中还有1987年发表的如《再论图书馆学研究的历史性进展》等文章，对历次讨论中的各种观点进行回顾和加以评论，这就更

加突出了集体研究的气息，延伸了课题研究的兴味和活力，增强了阶段性研究的透明度。

在组织围绕某些中心课题的讨论时，《通讯》有如一位豁达大度的长者，耐心地倾听着各种声音，容许各种观点舒畅地表露和表现；同时也不失长者的执着，不懈地将人们的讨论引向某些明确的目标。这样一来，使许多当今尚处于分散自发的研究者偶发的和一闪念的新的思想不再如同流星般地匆匆闪过，或自生自灭，而是在不断撞击中产生了新的火花。我们衷心希望各家刊物都能研究一下这类问题，自觉地推动集体研究，使更多的刊物成为学派学说或学术集体（志趣结合体）的核心、纽带或喉舌。

《通讯》与作者读者的新型关系，还表现于它和青年的关系方面。近些年来，《通讯》对青年的理论活动表现出极大兴趣。它在1986年武汉大学图书馆学院召开的“全国青年图书馆学情报学理论研讨会”上，别具一格地以刊物的名义召开“会中会”，吸引了不少青年参加刊物组织的“研究方向”的讨论。次年，《通讯》再次赞助华东师大召开的“全国中青年图书馆学情报学‘三新’研讨会”，并委托主办者再次专门组织“研究方向”的专题讨论。《通讯》这种不懈地吸引青年参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建设的作法，在理论界尤其是青年人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通讯》的这种做法，应该说是有胆识、有见地的。

如果说《通讯》与作者读者的关系还可以有所改进的话，那就是应该更多地组织理论界“元老”多参加一些他们所感兴趣课题的讨论，让理论界高层的声音更多更经常地出现在中国图书馆学报上。

## SUMMARY

### *Develop Charged Cultural Activities to Subsidize and Promote Cultural Undertakings*

Vice-minister of Culture Gao Zhanxiang pointed out recently at a meeting that subsidizing cultural undertakings with charged cultural activities being a creation of the people is at the start well approved and support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uch activities, having grown in pace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of reform, 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and of revitalization, are the result of ideological liberation. Practice so far has testified that charged cultural activities as the means to subsidize and to promote the growth of cultural undertakings, are getting to be known, understood and adopted by more and more people now. Thus they deserve more strengthened promotion. (page 7)

### **Again on Library Moderniz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China, the present stage of development and the realities of present-day library status, the push to modernize Chinese libraries inevitably needs the below prerequisites: firstly, the material means; secondly, the actual implementation of a system to guarantee the obtaining and the sharing of resources; thirdly, the establishment of a data base of Chinese documents; and lastly, proper adjustment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cultural role and information role of the library.

Author: professor of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and director of Pao Sui-Loong Library. His article "Modernized Library and Library Modernization" appearing in no.4, 1984 of "Bulletin of the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 was well received by readers. (page 21)

### *The Pursuit under High Pressure*

The article is a comprehensive, objective comment on the essays appeared in Bulletin of the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 1979—1988. Considering the heavy historical task of this Bulletin and the not at all properly staffed editorial board et al, the authors deem this journal as unique, because it mainly depends on the perserverence, vocational competence, the extensive yet profound knowledge of a dedicated editor-in-chief. Also the authors think that since this unique and promising journal has contributed greatly to library undertakings in China, to establishing a theoretic foundation of library science and to the bringing up of more professionals in the field, it duly enjoys prestige home and abroad.

Both authors are young teachers of considerable attainments. (page 57)

*50th year of Publication of "Red Star over China" Commemorated*

It is through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public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the variety of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Edgar Snow's masterpiece "The Red Star over China" that the writer attempts to examine the prominent effect and deep influence the book exerted upon Chinese society at different stages of Chinese history.

Also offered to readers of this issue are two prefaces. Hu Yuzhi and Wu Liping are two prestigious cultural figures and translators having much to do with the final publication of the said book. The two prefaces written separately by them in August 1979 are important for us to get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historical value of "The Red Star over China" as well as how the work was disseminated and what deep influence it exerted. (page 64)

**On the catalogue of the Collection of Buddhist Sutras and related scripts in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1)**

Through the lines of this article one learns something about the Buddhist Sutra Collection of Dunhuang in temples under the reign of Tang Dynasty, the Tibet, etc. One learns how appointed persons were responsible for management, lending, periodic check, payment for loss, and how messengers were sent to the "central land" to gather information of Tang Dynasty collection of Buddhist sutras, to seek the lacking volumes of Dunhuang, and to study the history of librarianship, history of religion, and the history of cultural interflow with foreign countries.

These valuable source materials will be published in batches for researchers interested in them. (page 88)